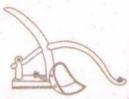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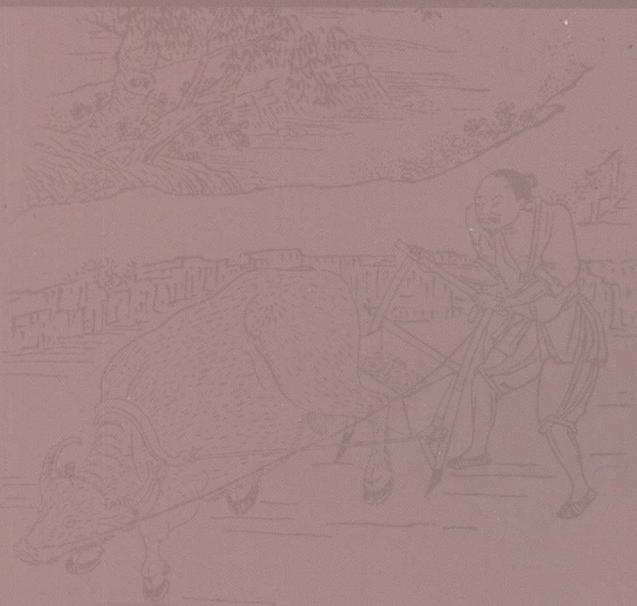
社会 经济 观念 史 丛 书



# 江南农业的发展

1620–1850

李伯重  
王湘云  
著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江南农业的发展

1620—1850

李伯重  
王湘云

著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 / 李伯重著;王湘云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  
(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4522 - 3  
I. 江... II. ①李... ②王... III. 农业史—华东地区—1620~1850 IV. F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4278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峰

封面设计 王红斌

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

李伯重 著

王湘云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 - 7 - 5325 - 4522 - 3**

K · 908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弁言

这是一套历史学研究丛书。

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中，经济史以厚重朴实见长，社会史以拓展创新饮誉，观念史则讲究精微灵秀，各擅胜场，各有特色。之所以把传统专门史学科中这三个彼此颇有畛域的领域，集约为这套丛书的总名，就是为了提倡一种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学风，为学术发展创造新的生长点。

古人治学，有所谓“考据、义理、辞章”，又有所谓“史学、史识、史才、史德”，都表达了对于学术品味和学人品质的至高追求。我们期待所推出的作品能够臻于这样的境界。

我们以此自勉，也以此与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同仁共勉。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6年5月

# 中文版自序

## 一

本书英文版于 1998 年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与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 (St. Martin's Press, Inc.) 刊出后, 学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 休·克拉克 (Hugh R. Clark) 教授在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6, No. 2, 1999)、吴承明先生在《中国学术》(第 5 辑, 2001 年 1 月出版)<sup>[1]</sup>、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教授在 EH.NET (July 2003) 上所发表的书评<sup>[2]</sup>, 给我帮助与鼓励尤大。2001 年, 本书又获得“第六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从这些反应中,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今天的“史学危机”中, 江南经济史依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之所以受到学界重视, 主要原因盖在于本书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近年来学坛关注的焦点。这个中心议题, 就是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对待

---

[1] 该书评即本书中文版的吴序。

[2] 该书评的中文本刊于《学术界》(合肥)2005 年第 1 期。

源于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特别是最近十年来,随着“加州学派”的出现,这个讨论更日益深入发展。虽然这个讨论源于西方(主要是美国),但也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柯文(Paul Cohen)、黄宗智(Philip Huang)、王国斌(R. Bin Wong)、李中清(James Lee)与王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在质疑和挑战西方中心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先后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后,也引起热烈的讨论。这表明这场讨论已经超越国界,在促进国际中国学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远未能达成一致,但都通过这个讨论得以大为提高。

本书被认为是“加州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由于英文版在国内不易获得,不少国内友人敦促我出一个中文版,以便让国内学者对本书有更多了解。我也认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在国内,本书确实非常应当在国内刊出,以求得国内学者的批评指正。不过,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是一件苦事,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总是想加上最新的见解和论据,但这样一来,译作就变成了创作,从而导致“失真”,使得中英文版实际上各自成为一部书。因此之故,迟迟未能着手本书的翻译工作。所幸的是,这一难题后来被加州理工学院的王湘云博士解决了。她不辞辛劳,将此书译为中文。我则对译文进行了修订,并将近来写出的关于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文章收入本书,作为附论<sup>[1]</sup>。于是在英文版刊出8年之后,有了这个中文版。

## 二

本书与我的另一著作《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的农业部分,在论题与史料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

---

[1]之所以加入这个内容,主要原因是生态农业是明清江南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之一,过去罕有学者论及,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兹将此文收入,可补充原书在此方面之不足。

的关系？不少学者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需要略加说明。

《发展与制约》的出版虽然比本书英文版晚了4年，但其完成却大大早于本书英文版。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通过了答辩以后，我又用了6年的时间，将该论文修改扩充为《发展与制约》一书，交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一直到2002年方得刊出。而本书英文版的写作开始于1992年，完成于1997年。在此5年中，随着自己认识的提高和更多史料的获得，我对于以往明清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成说的看法<sup>[1]</sup>，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这些成说，出发点都是西方中心论。由于这种改变，我对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读者如果对比这两部著作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结果，即可清楚地看到这个差别。同时，本书中还采纳了大量前书未曾使用的史料，并参考了更多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绝非“克隆”《发展与制约》一书的农业部分，相反可以说是对《发展与制约》中所持的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的产物。

### 三

在此，对本书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作一说明。

第一，由于本书中文版比英文版晚了8年，英文版中所引用的某些论著，当时尚未刊出，因此注明系待刊，并只能列出其名称和章节。但是到了现在中文版完成之时，这些论著已经出版，因此我在引用时也标明了其最新的出版信息（刊载杂志名称、期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等）。这一点，在此特作说明，请读者勿因1998年出版的英文版何以会引用1998年以后刊出的论著而感到诧异。

---

[1] 这些成说如“人口压力”说、“技术停滞”说、“劳动生产率下降”说，乃至“高水平平衡机制”论、“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论等。

第二,英文版蒙吴承明先生和斯波义信先生两位我最景仰的前辈惠赐序文,不胜感激之至。吴先生后来以其序为基础,写成一篇书评。由于此书评系吴先生用中文写出,比起译文来更能表现吴先生的行文风格,因此在中文版中,即以此替代原英文版序。

第三,本书引用文献的出版信息,仍然依照英文版的处理方式,一总汇集在书末的“征引文献目录”,而在正文的行文及页下注中仅注明作者名及出版年代。例如:

**高亮之与李林,1992:377—378。**意即高亮之与李林著《水稻气象生态》,农业出版社(北京),1992年出版,第377—378页。

**张履祥,1983:116。**意即张履祥著《补农书》,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本(即《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北京),1983年出版,第116页。

**包世臣,1888:卷二十五上,2b—3a。**意即包世臣著《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第二十五卷上,第2页背面至第3页正面(因系线装书)。

**山胁悌二郎,1964:48。**意即山胁悌二郎著《長崎の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馆(东京),1964年出版,第48页。

**Buck, 1930:129。**意即 John Lossing Buck 著 *Chinese Farm Economy*, Nanking (Nanjing):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the China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0 出版,第129页。

这种海外学术著作出版通用的方式,可以大大节约篇幅。但是如果有的读者因此而感到不便的话,在此深表歉意。

第四,本书引文中使用的方括号[ ],均系引者所加,而圆括号()则均为引文中原有之注。这一点,在此亦一并予以说明。

第五,本书中切口处的数字,系英文版页码。

## 四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本书英文版的写作开始于1992年,完稿于1997

年。中文翻译完成于 2004 年,但由于事冗,我一直未完成对译稿的审定。拖了两年之久,到今日方得完成此项工作。因此本书从英文版的写作开始,到中文版的定稿,前后历时 14 年之久。在这个漫长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蒙许多友人惠予帮助。我在 1996 年 9 月于剑桥大学写的英文版“鸣谢”中已表衷心感激。但是这个鸣谢并未包括尔后若干曾予我以大力帮助的友人在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激,特作补充如下:

本书初稿有 5 章,用中文写出,多蒙王国斌先生译为英文。与此同时,我将书稿扩为 9 章,自己用英文写出,又蒙王先生编辑。由于英文并非母语,在写作时常常遇到困难。所幸的是,在剑桥工作期间,与周绍明 (Joseph McDermott) 先生朝夕相见,得以常常向他求教,并得到他的热心帮助;

我 1996 年 9 月完成的书稿,实际上尚非定稿。此稿送交出版社后,我又继续进行修改,直到次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员时,才最后完稿。在此期间,曾得到濮德培 (Peter Perdue) 先生大力帮助(特别是在本书索引的编制方面)。

本书多蒙王湘云博士精心翻译成中文。翻译工作始于 2003 年秋,毕于 2004 年春。她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没有她的热心和努力,也就没有这个中文版。

本书的责任编辑黄晓峰先生,也做了出色的工作。

在此,谨向这些给我帮助的朋友深表感激。

又,此书在增补修订过程中,申请得到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一般项目“近千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本书也是该项目的部分成果(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发表的论文)。在此,对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的支持亦谨表谢意。

李伯重  
2006 年 3 月于北京清华园

## 吴承明序

我常说,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人们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实践,除很小部分外,都难说已认识清楚。并且,由于认识的时代局限性,一代人以为认识清楚的事情,到了下一代又会变得不清楚或不很清楚,需要重新研究。历史总是要不断研究,不断重新认识的。李伯重这部著作,就是以迄 20 世纪末的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来重新认识江南农业史的。

李伯重是我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史学家。他于 1978 年开始致力于唐代江南农业的研究,有专著问世(《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年)。1982 年起,他专注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整体性考察。接着,回到农业,他从两个方面,即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和资源利用的合理化,来论证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完成系列的专题研究。他证实,在没有重大技术改变的情况下,土地、水、劳动以及畜力等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亦即资源配置一定程度的优化,是可能的,并详察其绩效。又提出,自唐至清,在江南水稻生产集约化过程中,劳动的投入并无大变动,而资本投入(特别是肥料)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他又提出江南农业“外向化”的论点,即它的丝、棉产品主要是外销,而粮食、肥料等大量依靠外区输入;并进而研究了江南在物质、劳动、资本和技术上与外区的输出和输入,及

从中得到的分工和比较利益,是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他的这些论点深受学术界重视,有些并引起讨论和后继的研究。90年代,他又对明清江南的人口、环境(气候)、农业技术等作了系列的专题研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对江南人口和人口行为(控制生育)的考察,以及劳动力增长与在一定生产模式下劳动力需求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迄1850年以前,江南农业中并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在某些生产模式转换时期还曾出现劳动力不足。

李伯重的这些专题研究都是实证性的,发表为论文和研究报告近20篇;读者常以其论证之周详和新发掘的与罕见的资料之迭出而叹服。本书《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就是在这些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正和在若干问题上的重要补充,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

本书是90年代初作者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cholars)任常住研究员时开始命笔的,几经寒暑,数易其稿,到1996年秋才完成,时作者已转到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任客座研究员了。本书选择1620—1850年即我国通常所称“清前期”这个时间段,是因为与出版社约定的书稿篇幅有限,也因为正是这个时期,对江南农业“衰退”、“停滞”、“有增长而无发展”以及“人口爆炸”、“过密化生产”等议论最多;澄清这些观点,是重新认识江南农业史的关键。在这方面,作者不是对任何观点作理论辨析或批判,而是尽力详考江南农业发展的历程和绩效,从历史认识上予以澄清。这是一个史学家应有的态度。而为了明确历史发展的历程和绩效,必须有比较研究。本书在许多问题上都追溯到明后期以至宋代这两个江南农业有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时常下延到1850年以后江南农业的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以至1949年后的复兴,以确定“清前期”江南农业的历史地位。这又是经济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必要。

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即江南劳动力、土地、气候和农业技术的变迁。这些变迁是江南农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篇“农业生产的变迁”,讲了三个问题,即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

生产的集约化，农业的外向化（externalization）。这三者实际是清前期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第三篇“农业的发展”，包括两个命题，即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里的“生产力”（productivity），也就是“生产率”，它表示农业发展的实际绩效，因而是本书研究的最终目标或结论。这两个命题，在作者过去的专题研究中都曾述及，但在本书中展开全面讨论，考证綦详，尤其是劳动生产力一章，等于是全新的研究。下面我也就劳动生产力这一章的论述，作些评介。

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须对劳动生产率有个明确的概念。李伯重早在70年代末研究唐代江南农业时即提出，考察中国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用现代工业中的概念：工业劳动生产率是按劳动日或小时计算，传统农业则应按年计算；工业劳动生产率是以工人为单位，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工业所计算的是一个工种的单一劳动，传统农业则须计人大田和工副业多种劳动。此外，工业劳动生产率是以货币计值，传统农业则常以实物计值，因农民主要是生产使用价值。这些论点十分精湛，切合中国历史实际，西方学者常因此陷于胶柱。

本书前几章的研究已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依据。例如，书中估计了17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江南的农业人口和稻、桑、棉的播种面积；并认为这期间稻的亩产量增长了45%—50%，稻与麦（或豆、油菜籽）二熟制的指数由140增为170；丝业的工作效率无变化，纺织则由每匹布7个工作日减为6个，等等。但是，作者并不是像在工业经济学中那样构建一些公式来推导劳动生产率。由于这些数据大都是事例的或估计出来的，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能令人信服，甚至会产生误导。我一向认为，在没有系统统计的古代史的研究中，计量学方法应主要用于验证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单独作出判断。本书就是用实证的理性分析得出江南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动力、途径和方式，再用计量法给出设想的内容。

作者在本书中，是从江南二熟制的发展、家庭农场规模的演变、农家劳动的分工上，来考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二熟制的发展，意味着土地、水、劳动等资源的合理运用，是单位产量增长的主要途径，也是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基础。他详细考察了稻、麦、油菜籽以及转换作物(这种转换也是资源的合理运用)桑、棉等生产条件以及生产成本和使用价值,认为到19世纪中叶,江南的农业生产结构已达到最佳配置。超过这个限度,例如康熙和道光时都曾受命试种双季稻,均遭失败。

家庭农场,原来规模颇大,到明后期已缩小到15亩左右,到19世纪中叶降至10亩左右。这并不是由于“人口压力”或人地比率的限度,而是由于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下家庭劳动力的制约。作者曾详细考察,用工最多的桑蚕区,尽管桑地和稻田的搭配有多种方式,而一般共为9亩,顶多10亩。植棉区,一般4亩棉花需配置6亩稻田。盖超过一定比例,就不能保证治丝或纺织的劳动力,不易经营。占60%的水稻种植区,在单作作物时,每家可耕种20亩,而在二熟制下,有牛户可耕种10亩,无牛户仅种7—8亩,超过10亩者常需雇工,加重管理困难。“一夫十亩”是江南二熟制下家庭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最佳规模,从而也可以最大发挥家庭的劳动生产力。太平天国以后,江南人口剧减近半,但农场规模并未扩大,因为从生产经营上说,扩大没有什么好处。

作者考察,自宋代直到明中叶,江南农家都是男女同下大田劳动,并同在农暇时从事育蚕缫丝或纺织。“男耕女织”是在明至清中叶江南农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到19世纪中叶,已很少农妇下田的记载,下田也主要是除草、施肥等轻活。这种男女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妇女因生理关系,大田劳动总逊于男性,又因需理家务,适于户内生产。桑蚕的利益,按每亩田计,可达种稻的3.6倍。棉纺织的利益,因布价下降(明后期一匹布值2.3斗米,19世纪中叶仅值1斗米)而减少,但纺织无税,仍优于大田。分工使妇女专业纺织,效益大增。而大田生产,原由2人承担,改为1人,等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不过,其所以能由农夫一人承担,端在于农场缩小近一半,可是由于二熟制推广,产量并未减少一半,所以农夫的劳动生产率仍有提高。

因此,作者把“二熟制”、“一夫十亩”、“男耕女织”称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江南农民经济模式”。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即三种最佳组织或

结构的有机结合下,劳动生产率达于最优。这种分析,主要是采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史学理论;所谓“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无成文规定的经济运行制度和结构体系。比之过去史学界常用的因果链和线性发展的分析方法,是一大进步,因而也更具说服性。

在这种实证的理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他所据有的文献和估计的数据,作了计量分析。他在原书中是逐事逐段详细解说的,我仅择其中三事,并为了节约篇幅,制成三个其义自明的表。表一是以何良俊在《四友斋从说》中所说松江西乡的情况作为明后期的个案,以姜皋在《浦泖农咨》中的记载代表清中叶的个案,比较大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增24%)。表二是江南全区的宏观比较,按作者估计的数据计算,两个世纪大田劳动生产率提高80%。这是因为,何良俊所举松江西乡例的农场面积和亩产量都比较突出,一般没有那么大。表三是用表一的事例比较两个时期实际两种制度下纺织的效率,计增5倍。从中还可看出,在农场面积达25亩、又无二熟制和男女分工的情况下,仅能织布9匹,自用而已,无经济效益。这三个例子,尽管在数据真实性上可以挑剔,但足以证明“三位一体”之说,殆非虚构。

表一 松 江

	明后期(何良俊)	清中叶(姜皋)
户有耕地(亩)	25	10
亩产量(石)	稻2.5	稻3,麦1
总产量(折稻,石)	62.5	37
每亩成本(折稻,石)	1	1.25
净收入(折稻,石)	37.5	24.5
耕作者	夫妇2人	农夫1人
人均净收入(折稻,石)	18.8	24.5
劳动投入(每亩15日)(日)	375	稻150,麦30
每个劳动日产量(折稻,斗)	1.7	2.1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

表二 江 南 估 计

	17世纪中叶	19世纪中叶
户均耕地(亩)	15	9
复种指数	140	170
播种面积(亩)	稻 15, 麦 6	稻 9, 麦 6
亩产量(石)	稻 1.7, 麦 1	稻 2.5, 麦 1
总产量(石)	稻 26, 麦 6	稻 23, 麦 6
总产量(折稻, 石)	30	27
耕作者	夫妇 2 人	农夫 1 人
人均产量(折稻, 石)	15	27

表三 纺 织 例

	明 后 期		清 中 叶	
大田经营	田 25 亩, 单茬稻共需 375 个劳动日(15 个/亩)		田 10 亩, 二熟制共需 180 个劳动 日(稻 15 个/亩, 麦 30 个/亩)	
	农夫	农妇	农夫	农妇
能用于生产的劳动日	300	200	300	200
整地所需劳动日	50	—	20	—
其他大田所需劳动日	163	163	160	—
碾米磨面所需劳动日	62	—	37	—
大田活外剩余劳动日	25	37	83	200
全家剩余劳动日	62		283	
织布一匹所需劳动日	7		6	
全家可织布匹数	9		47	

刊于商务印书馆《中国学术》第五辑

2001 年 1 月

(英文版序撰于 1995 年 1 月)

# 斯波义信序(英文版)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与相伴的产业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清楚地凸显了出来。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今天发生的变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特别是,在生产要素、条件和市场结构等方面,过去和现在的变化之间具有何种关系?而在这些方面,江南占有突出的地位。本书将今天经济成长的根源,直接追溯到清代前中期江南经济进步中的农业发展。本书是一部空前的研究成果,向国际学界提供了新的知识,在大量的一手史料的基础之上,把定性与定量分校结合了起来。

李伯重博士早先出于傅衣凌教授门下。在完成了硕士论文(1981年)和博士论文(1985年)后,他继续研究唐代中期到清代中期江南农业的发展。他在发掘细节的重要史实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此基础之上,他分析了在此一千年中,江南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变化的长期趋势。他曾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中心、美国密执安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工作,积极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又考虑到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他用新的、精确

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改正了学界过去的许多错误。他的解释依靠坚实的证据。他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的著作已于1990年出版，本书继续这个研究，把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的发展置于对证据的多层面讨论中。

本书第一编讨论生产要素（劳动力、耕地、技术），第二编观察农业生产（资源使用的合理化、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外向化趋向农业的形成），第三编则分析农业发展本身（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此，我将本书的一些要点简述如下：

首先，本书从许多视角出发，对清代前中期江南经济继续明代后期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分析。本书主要的论题，把过去十年中的许多见解都结合到了一起（如王业键教授对粮价和货币供求、运输的效率等进行了分析，对“市场整合的水平”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因素表明清代前中期以江南为中心的经济成长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但是，王教授所关注的是流通的整合，而未谈及生产。在本书中，作者超出了对劳动、土地和技术改进的讨论，展示了农民如何更加合理地选择资源（资源使用的合理化、生产的集约化与专业化、劳动的区域分工、市场参预的扩大，等等）。同时，作者也显示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如何不同于西欧经营，以及这个发展如何始于清代。

第二，本书避免从一种没有空间差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史，也避免认为发展必定要经历一组简单的阶段。本书选择了长江三角洲（即江南），并收集了资料以分析之。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地区遵循着不同的周期变化方式；而在同一地区，经济变化也包括上升、稳定和衰退的时期。如果对中国经济做一泛泛结论，就很容易犯错误。本书以多种分析指标为基础，选择了从唐代到清代这一时期为背景，来检验清代的确定事实，并开始进行区域比较。同时，本书很好地处理了史料不足和分散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自唐代以来，江南一直是一个发达地区，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史而言，江南并不具有典型性。但是，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轨迹，我们才能用它来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